

安妮与我们——历史之倾诉 “安妮·弗兰克——历史的见证”开幕式致辞

方复礼 (J. D. Van Vliet)

曹菁菁译

女士们，先生们：

这是安妮·弗兰克巡回展在中国大陆的首场展览，我非常荣幸能够出席开幕式。在此我谨代表荷兰阿姆斯特丹安妮之家博物馆的朋友们，感谢大家让我有此机会为本次展览说几句话。

首先我要特别感谢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陈力副馆长，张志清主任，严向东主任，以及他们的团队。没有你们的努力，我们就无法站在这里。非常感谢。

我想带大家回顾一下历史。因为安妮之家的工作有双重意义，她不但让人们了解还让人们记住二战期间曾经发生过什么。同时，她还努力架起联系二战后历史与世界当前形势的桥梁。

《安妮日记》之所以在世界内如此闻名，其原因之一在于，这是一个女孩的故事，一个家庭的故事，一个关于人们藏身于密室的故事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受害者们有着具体的形象，具体的名字。《安妮日记》是一个孩子的声音，是一个真实历史中真实女孩的声音。《安妮日记》象一扇窗，透过它，我们可以了解那段大屠杀的历史。那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系列杀戮行为，有六百万犹太人在欧洲被杀害。

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历史。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痛苦记忆，难以追述，难以提及。

我得说我并不太了解中国历史。但我也知道日本军队在南京曾犯下相似的大屠杀罪行——大量生命惨遭杀戮，许多平民无辜受虐。直到今天，这段历史仍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深的创伤。当日军主谋者、旁观者甚至刽子手拒绝承认他们的罪行时，那些痛苦的记忆对受害者和幸存者来说就更加难以承受。

我们也不得不对历史的阴暗面。我的祖国，荷兰，也有不堪回首的历史：对外战争，贩卖奴隶，还有殖民扩张。要政府和人民敢于坦白承认这些历史的阴暗面，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。荷兰更愿意说自己是一个小而勇敢的国家，更愿意提起很多抵抗德国占领的英雄。然而，她却不愿承认在德占期间有很多荷兰人也为德国人做事，不愿承认当犹太人隔离时，大多数人选择了保持沉默，选择了袖手旁观。因为，把所有的指责推向德国人要容易得多。

现在我们渐渐开始承认，当时荷兰的态度还是比较被动的。

反犹太主义直到 1945 年也并没有消失。很多非犹太人不愿意提起自己身边的大量犹太人被杀害了。那是一段让人不舒服的历史，很多人更愿意避而不谈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60 年代甚至 70 年代。但此后的一代人，开始询问大屠杀历史。孩子们问他们的父母，祖父母：你在大战时都做了什么？咱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什么？谁知道？有没有更多的犹太人被救？我们家附近，我们镇上的那些犹太人、吉普赛人都经历了什么事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新一代人开始寻找答案。由此，大量的书籍、电影、展览、自发活动以及教材应运而生了。

我们对那些曾在德占时期挺身而出的人表示崇高的敬意，比如那些曾帮助犹太人藏匿的人。由于他们的自发行动很少见，所以更值得我们铭记。这次展览中，我们特意提到了吉斯女士 (Miep Gies)。她是一个平凡的女孩，原籍奥地利，是安妮的父亲——奥托·弗兰克先生的打字员。1942 年，当安妮一家打算躲进办公楼后的密室时，弗兰克先生问她是否愿意为他们这些藏匿者运送食物及采购日用品。吉斯女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也许当时她是一时冲动，但很快，她就知道这是一份艰巨而危险的工作。

吉斯女士总是说，我不是英雄。我想她是想说，她所做的一切很多人都可以做到。调查了在大屠杀时曾帮

助过犹太人们之后，我对教育感到惭愧。我们的民众中，有勇气的太少了。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，以求自己的生活尽可能地不受干扰。

我想让来此参观的人们，特别是孩子们，考虑如下的问题：如果身在当时，我会做什么？我会在哪里？我会帮助他们吗？我敢吗？这些问题如同 60 年前一样真切。因为在当今世界，各种歧视和种族主义仍然存在。谁在真正关心那些非法移民、收容所流浪者、难民和贫困人群呢？

女士们，先生们。

这次展览的宗旨在于四个字：尊重差异。得到他人的怀念和尊敬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们也不必操之过急。不过青少年是我们的希望，他们可以开始学习如何互相交流，如何互相尊重。

我祝这次展览能够得到各界的支持和关注，取得成功。

再一次感谢所有为此展览做出贡献的人们。

谢谢大家。

2007 年 12 月 22 日

